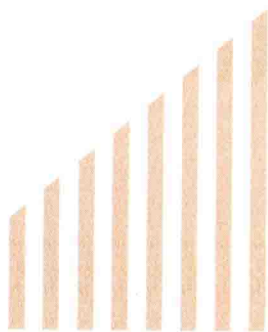


改革新启蒙

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

张维迎◎著



靠利剑征服世界的人最后都失败了，
但是靠思想的人成功了。

伟大的变革由观念的变革引发
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



中信出版社·CHINA CITIC PRESS

改革新启蒙

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

张维迎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改革新启蒙：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 / 张维迎著. — 北京：中信出版社，2014.7

ISBN 978-7-5086-4585-8

I. ①改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国—研究 IV. F1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096695号



改革新启蒙：思想市场驱动中国变革

著 者：张维迎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 (China CITIC Press)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：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：17.5 字 数：175千字

版 次：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4585-8 / F · 3193

定 价：4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改革需要新启蒙

决定社会变革的主要是两个因素：一个是理念，一个是领导力。理念可以正确也可以错误，领导力可以弱也可以强。最好的组合是正确的理念、强的领导力，最差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、强的领导力。当然还有次好的或次坏的组合。强的领导力两个极端都有可能，但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可以对中国过去 60 多年的历史给出一个解释，前 30 年领导力强但理念错了，所以出现了“大跃进”和“文化大革命”这样的灾难。改革前 25 年有好的理念和比较强的领导力，所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。后来的 10 年，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停滞甚至倒退，是因为我们的理念倒退了。

现在人们老讲改革阻力，现在改革阻力确实很大，但我们不要以为 20 世纪 80 年代、90 年代没有阻力，没有既得利益集团。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，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，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。改革前 25 年和我们现在最大的区别不是那时没有改革的阻力，也未必是现在的阻力比那

时强大得多，而是那时改革动力比现在强得多，那时候从上到下有一批人以改革本身作为使命，他们没有那么多计算，现在不是这样了，大家都在等着别人改。

中国未来的改革，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是否能成功，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理念和领导力。正确的理念来自思想市场的竞争，只有思想市场的自由竞争，才能使我们走出错误理念的陷阱，为我们的改革创造新的思想和观念。

人类历史上，我觉得有两个 500 年是创造思想、创造观念最重要的时期。这两个 500 年所创造的思想，就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，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，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。

第一个 500 年就是在公元前的那 500 年，所谓“轴心时代”。大体来讲，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 500 多年。这 500 多年里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，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，包括孔子、老子、苏格拉底、亚里士多德、柏拉图、释迦牟尼、耶稣，等等，都出现在那个时代。他们所创造的思想，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。

第二个 500 年就是从公元 14 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 18 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。一般认为，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，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、卢梭等。其实不光是法国，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·休谟，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，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第二个 500 年跟前一个 500 年不太一样。前一个 500 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？当时天下大乱，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“天下无道”变得“天下有道”，他们更多强调的是对人的内心的改造，无论是创造宗教，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，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。第二个 500 年里，思想家们

更多强调的是人的权利、人的尊严、人的自由。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，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，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，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，别人不可剥夺。在这个基础上，人类又要相互合作，共同发展。启蒙思想家认识到，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“心”，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“行”。亚当·斯密讲的“看不见的手”的市场机制，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，都是为了人的幸福，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，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，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。比如，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，一个人如果想赚钱，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，否则你不能赚钱。这就是亚当·斯密的理论。启蒙思想家认识到，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，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法治和民主的约束。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？过去说是上帝给的，也就是所谓的“君权神授”，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“天子”，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。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，也就是人民的同意。而且，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，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，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们恶的这一面？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，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。这就是法治和民主的含义。

第一个 500 年，东方和西方一样辉煌。但坦率地讲，第二个 500 年里，我们中国没有出现非常伟大的思想家，至少没有办法和西方出现的那些伟大的思想家相比。到 100 多年前，鸦片战争之后，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，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，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。1919 年发生的“五四”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。其实“五四”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，包括自由、法治、民主思想的引进。很遗憾，“五四”之后没有多长时间，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。我们用“主义”代替了“启蒙”，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，我们做了一顿夹生饭。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好多理念，我觉得还不如

100年前。今天我们知识界的一些思想，也不如100年前知识界的那些思想。这也意味着，人类并不总是在进步，倒退是可能发生的，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发生了。

30多年前，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，也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，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10年时间就停止了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我们今天面临着与100多年前同样的问题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，这个时代应该到来，而且一定会到来。

康德说：“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。”“要有勇气运用你的理智！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。”启蒙是一场思想和观念的变革。新的思想和观念最初总是由少数人提出来的，但只有当这些新的思想和观念变成多数人的共识的时候，真正的社会进步才会发生。

本书是我2012年出版的《什么改变中国》的续篇，传递的是我有关市场、自由、法治、民主的理念，有关人类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理念。我把传播这些理念当作自己的学术使命，希望以此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做出自己的贡献。

张维迎

2014年6月3日

目 录
CONTENTS

序言 改革需要新启蒙 / V

开篇 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 / 001

第一篇 理念和领导力决定改革走多远 / 021

理念可以铸就未来 / 023

改革与改革家 / 029

什么是真改革 / 043

邓小平是伟大的制度企业家 / 050

市场化改革和企业家命运 / 054

我对改革仍然抱有期待 / 063

社会有深层的变革力量 / 066

普通民众的观念变革很重要 / 070

重启被中断的改革 / 073

改革不能闭门造车 / 078

走出脑子里的深水区 / 083

不要以为中国多特殊 / 089

国家气质亟待改变 / 093

第二篇 中国需要新启蒙 / 103

市场和自由是一回事 / 105

市场逻辑的权利基础 / 123

既得利益者能否成为启蒙者 / 144

权利启蒙任重道远 / 150

权利正当性来自天赋 / 153

我的思想更接近奥派 / 159

儒家思想和自由主义不矛盾 / 165

莫干山会议的启蒙作用 / 168

《为钱正名》30年 / 174

第三篇 破除对国企与政府的迷信 / 179

国企与公平竞争不兼容 / 181

国企并不真赚钱 / 195

国企的无形资源垄断 / 198

政府的正确定位 / 203

监管越多问题越多 / 206

第四篇 正确理解法治与民主 / 209

人治大于法治对谁都不好 / 211

法律要合乎天理 / 215

民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 / 218

从博弈论看腐败 / 226

尾篇 追求沉思与顿悟的快乐 / 235

致谢 / 269

开篇

改革的理念比顶层设计更重要^①

任何伟大的变革都一定有先进的理念，只有这些理念能够战胜当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，才可以往前走。

现在好多人说的顶层设计是指，我们有一个统一设计的改革方案，有一个宏伟的蓝图。我觉得这从历史上看不是很现实，历史上好多成功的改革，都不是靠那种所谓的顶层设计。

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人的利益，都会有人反对，关键是你有没有改革的理念。很多改革听起来很复杂，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。

^① 来源：新浪财经《财经面对面》；访谈人：权静；时间：2012年9月13日

市场机制缺失导致腐败严重

访谈人：首先，恭喜您这本新书的出版，叫《什么改变中国》，我想知道为什么给新书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？

张维迎：我们中国改革到今天其实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刻。在过去 10 年里好多改革都是停滞的，今天人们对改革，包括中国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，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为什么出现这些问题？只有认清这些问题，我们才能知道未来应该怎么走。这本书取这样一个名字让我们反思过去，我们改革的成就究竟是如何取得的，这些问题是怎么出现的，然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未来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、用什么样的政策推动我们的经济改革。

访谈人：我看到您序言的题目叫“理念决定未来”，这是您这本书想传达的一个核心意思吗？

张维迎：是的。其实我强调两个方面，一是理念，二是领导力。理念，

就是我们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。我们过去 30 年的改革，特别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、80 年代、90 年代，都是新的理念战胜旧的理念，理念战胜利益。我们现在想到改革，就想到利益集团、阻力。其实，任何改革都有利益集团的阻碍，中国过去的改革也不例外。我们怎么突破这些阻力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当时的领导人，比如邓小平，有一种理念，就是这个国家必须给人民更多创造性，更多自由，我们必须引进市场机制。当时农村改革的时候，争论是非常激烈的。万里已经到了非常动情的程度，他说：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，但是你不要把我的独木桥给砍掉了。如果没有这样的理念，我们当时什么都是按照利益计算，改革是不可能的。从古到今都是这样的，任何伟大的变革都一定有先进的理念，只有这些理念能够战胜当时体制下的既得利益，才可以往前走。

访谈人：您觉得过去这 10 年的理念是什么？有理念吗？

张维迎：我觉得过去这 10 年理念倒退了，或者我们失去了理念。结果，我们好多政府政策是利益主导了理念，也就是不谈是非，只谈利害。尤其如果上面没有很好的理念，下面的政府部门和官僚就变得一味追求更大的权力。现在有很多政府部门名义上打着改革的旗号，其实是做着反改革的事情。总结改革 30 年，什么时候我们有好的理念，有坚定的领导力，改革就会往前走，我们就会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。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理念，改革就会倒退，而不是仅仅停滞了。你只要不往前走就会倒退。

访谈人：能不能在这里给我们准确地描述一下您所说的理念决定未来，这个理念到底是什么？

张维迎：理念最重要的一点是相信人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，人的创造力只有在自由、竞争的社会中才能迸发出来，相信市场是推动人类幸福、技术变革和社会进步最重要的制度安排。这一理念是最重要的，如果对市场本身没有信心，我们就会把出现的好多问题归咎于市场本身。但是我在书里面提到，如果看一下我们改革的过程，你会发现，我们出了这么多的问题，恰恰是由于我们市场化的推进受到了阻碍，特别是在过去的10年里，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？因为没有了这种理念，就没有一种威慑的力量，好多人就会以改革的名义追求不正当的私利。如果有一种正确的理念威慑他，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不正当的感觉。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理念，他做这些事觉得是很正当的。现在好像要改革反倒有点儿不正当，名不正则言不顺。而恢复过去体制的做法，给政府增加权力的措施，则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做，好像非常正当。

访谈人：所以上面的理念非常重要。

张维迎：这也是我说的理念和领导力。普通人的理念也重要，但是它的影响是长远的。领导人本身负有责任，也就是让人们接受一种新的理念。再回到包产到户。当时一些农民都不一定接受它，但是因为上面这些领导人的理念，最后大家都接受了。城市改革也是这样的，一开始好多个体户或小老板被抓起来了。最典型的就是芜湖的年广久，他就是雇人炒瓜子。在我们过去的观念里，雇人就是剥削，就是资本主义，就是违法的。由于有邓小平保护他，他才没有被抓。但是邓小平保护他，不是说邓小平对他这个人有什么感情，邓小平对他没有什么感情，邓小平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那邓小平为什么保护他？他是想告诉人们一个方向，就是给社会一个信号，我们这个

社会将会往哪儿走。

成功的改革不靠顶层设计

访谈人：现在很多学者也在呼吁，说中国的改革需要顶层设计。您对这个顶层设计是怎么理解的？这跟您说的来自领导力的理念是一致的吗？

张维迎：不太一样。我理解现在好多人说的顶层设计是指，我们有一个统一设计的改革方案，有一个宏伟的蓝图。我觉得这从历史上看不是很现实，历史上好多成功的改革，都不是靠那种所谓的顶层设计。

访谈人：为什么？

张维迎：因为你的信息是不全的，生活总是在调整，而且好多信息，包括好多制度的信息来自基层，来自老百姓。最上层的人怎么能够知道每一个人在想什么，需要什么？这是不可能的，正因为这样我们才需要市场经济。

另外，人的观念变革需要一点儿时间。如果你一开始就把所有事情都跟大家讲明白，那好多人反倒被吓住了，改革就没办法往前走了。我在很早之前举了一个例子，像妈妈带着孩子到姥姥家。孩子走一会儿路累得不行说不走了，他妈妈说很快就到了，其实还很远呢。如果你一开始就告诉孩子说一共20里现在才走了10里，小孩肯定坐在那儿不走了，永远到不了外婆家。但是他妈妈告诉他快到了，一会儿就到了，那么慢慢地小孩真的有这个勇气逐步走下去。这两个原因就是说，如果把顶层设计理解成从上到下整体的改革方案，我觉得是不现实的，不可行的。但是，如果领导人有一个很好的正确的理念，又非常有责任心、使命感，同时又有那种魄力，敢冒风险推动这

些事，下面人看到了大方向，每一个人就会去创造。我们回过头讲，20世纪80年代深圳、广东的改革，那不是中央设计出来的，邓小平也看不到深圳的发展、广东的发展会那么快。但是有一点邓小平很清楚，中国各地不一样，应该给地方更多权力。广东、福建是沿海地区，在海外有很多华侨，所以它们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发展自己。这就是个理念。当时最早是习仲勋，后来像任仲夷这些人在广东主政的时候，做出好多创新。中央好多部门对这些创新是反对的，中央每一个部门发的文件都说广东、福建不能例外，那怎么做？就靠邓小平等人的支持。他们的很多做法跟很多现行规则并不是很相符，但是符合邓小平改革的精神，他们就去做。有时候他们也会受批评，任仲夷好几次被召回北京到中纪委开会，让他做检查，上纲上线，调子定得很高，比如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，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。有一次任仲夷做完检查后担心回去把挨的批评告诉广东当地的干部，大家可能就没有信心了。于是他找胡耀邦问回去以后怎么传达这个精神。胡耀邦说：你看着办，你想怎么传达就怎么传达。这就是个理念。

任何改革都会触动人的利益，都会有人反对，关键是你有没有改革的理念。我们现在很多改革听起来很复杂，其实真的没那么复杂。

访谈人：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改革的路径，您心目中的路径，肯定不是刚才我们所讨论的顶层设计这种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路径。那么，改革的路径在您看来应该是什么样的？

张维迎：中国的改革上边要有领导力和理念，下边要给普通老百姓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给他们自由。好多改革都是最初地方提出，最后上面的领导接纳了，承认了。我们坐在办公室的人，怎么可能知道每一个地方具体应该采